



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

——怀念李霁野先生

谷羽

己。1979年,我进入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苏文学教研室,给学生讲俄罗斯文学史,教课的业余时间尝试翻译诗歌,并向报刊投稿,但是屡投不中,四处碰壁。有一次见到李老,他问我写不写诗,我回答说写得少了,但翻译了一些,就是发表不了,感到苦恼。李老听了说:“这样吧,选几首你觉得好的,我给你推荐推荐,试试看,行不行。”我选了四首克雷洛夫寓言诗和两首莱蒙托夫抒情诗交给了李老。过了不久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(1979年6月21日)发表了克雷洛夫寓言诗《鹰与鸡》《驴子和夜莺》,《新港》(1979年第7期)刊载了莱蒙托夫抒情诗二首《宝剑》和《浮云》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了铅字印在报刊上,得到了社会承认,我心里很激动,也特别感激李老。没有李老的推荐,我不知道还得摸索多长时间,也许多次碰钉子以后会变得心灰意冷。初次成功带给我的除了喜悦,更多的是信心和力量,我暗下决心,继续译诗,不断探索,不断进取,力争有所进步,不辜负李老的扶持和勉励。

有一次我去李老家,他谈起了自己早年的经历。他说,他十九岁离开安徽到北京求学,当时家里人口多,不富裕,他必须自己挣学费,所以一边在崇实中学读书,一边翻译一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,居然可以维持生活,有时还能给家里寄些钱,接济家用。李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跟我们相比,你们的起点高多了,只要持之以恒,必有收获。不过,你要记住,翻译难,文学翻译更难,诗歌翻译尤其艰难。英国人翻译的诗歌不可胜数,但公认成功的只有菲茨杰拉德译的《鲁拜集》。译诗,需要反复推敲,精琢细磨,一要对得起作者,二要对得起读者。”李老还鼓励我说:“你现在不到四十岁,我今年七十多了,你要坚持下去,到我这个年龄,你能干多少事情啊!”李老的话,不仅记在了我的日记里,而且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,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。

记得1980年夏日的一天,我在学校图书馆门口碰见了李老。李老跟我说:“去北京开会,在书店见到了《克雷洛夫寓言》,我买了一本送给你作参考。回头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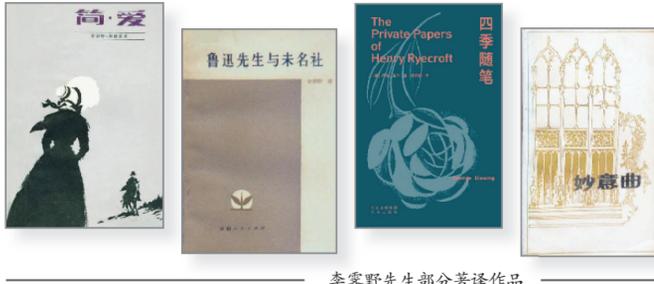
到办公室去拿好了。”过了两天,我拿到了吴岩先生译的《克雷洛夫寓言》,他是从英文转译的,诗体译成了散文。我领会了李老的用意,他希望我把俄文原作直接译成汉语,要用诗体翻译,并且要译出一本书来。李老这种无言的关怀让我永远难忘。当我完成《克雷洛夫寓言选集》译稿以后,李老将其列入“未名丛书”第一辑,那是他和朱正先生共同商定,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,丛书的名字与上世纪20年代的“未名社”显然是一种呼应。不久之后,朱正先生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专职负责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辑工作,湖南的“未名丛书”只出了三本,便因人事变动而搁浅,《克雷洛夫寓言选集》也就未能在湖南问世。过了三年,这本书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,我选用“驴子和夜莺”作书名,因为这首寓言诗是李老推荐发表的,对我来说,有特别的寓意。还有一件小事也记在我心里:我翻译了立陶宛一位诗人的长诗《普罗米修斯之火》,写后记的时候,想参考一部译成中文的长诗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》,到图书馆去借,图书馆没有这本书。后来遇见了李老,说起这件事,他说,我给你到市作协资料室去看看,也许那里面有。过了两天,李老就把书借来了。说起事情好像很小,但李老对于晚辈的关爱之情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1993年秋天,我中风面瘫,大病一场,不知是谁告诉了李老,李老给我妻子打电话,一再嘱咐要好好照顾,让我别急着看

书,一定要安心休养,要吃好一点儿,耐心治疗,等好利索了再做别的事情不迟。老人家足足嘱咐了有十几分钟,我和妻子感动得掉了眼泪。我的父母已经不在,还有谁会对我这么关心?其实,受到李老关怀的岂止我一个人!1984年,天津市文联为李老八十寿辰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举办庆祝会,有一位军官讲了一件往事,他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上一学期期间,家中突发变故,十分困难,想要退学,李老知道了,把他叫到家里,单独对他谈,以后每个月资助他十块钱,帮他解决一点困难,并且嘱咐他,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就这样他得以继续读书,直到家境有所改善,李老才停止了资助。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,他愿意在李老八十寿辰时讲出来,向恩师献上一瓣心香。这位军官是英语专业1962年的毕业生,名叫高书究,大学毕业后入伍成为解放军,奔赴新疆,在保卫祖国边陲的岁月里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青春。

由于李老的关怀和指引,我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,因此,每出版一本书,一定先送给李老。可是,我送给李老的书,没有李老送给我的多。从1984年到1993年,李老给我的书共有八本:《简·爱》(给少男少女)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《妙意曲》《乡愁与国瑞》《四季随笔》《唐人绝句启蒙》《唐宋词启蒙》,每一本扉页上都有李老的签名,每一本书都是无声的鞭策。现在,每当我看到那工整而有个性化的题词,就情不自禁回忆起李老的音容笑貌,仿佛他在含笑注视,问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,翻译诗歌不是反复推敲,精琢细磨。想到这一点,我就不敢懈怠。李老一生的译著超过五百万字,他那孜孜以求的精神,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。如今,我已退休多年,但退而不休。李老八十仍然译诗,九十还在著书,是我心中学习的榜样。我要持之以恒地从事翻译和著述,为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。李老的著作摆在我的书架上,仿佛李老就在我身边,我仍然可以和他对话交流。

我是幸运的,因为我是李老的学生,李老对我的关怀和指教,铭记在心,永远难忘。



李霁野先生部分著译作品

我藏有一方寿石工治的印,还有一方金禹民为我治的印,这师徒二人的作品各具特色。寿石工(1885—1950),浙江绍兴人,名玺,字石工,号燕、硕(音石),号印巧、燕客、园丁、无量、珏公、珏庵,还有冷荷亭长、石尊者等别号,斋名湘怨楼、辟文堂、含光轩、绿天精舍、春声馆、铸梦庐等。寿石工先生极喜爱赵之谦和吴昌硕的印,曾见吴昌硕白号“五湖印巧”“十亩园丁五湖印巧”,故而他又号“印巧”。

巢章甫《海天楼话》有“不食鱼斋”一文,写道:“山阴寿石工夫子,食舍鱼。刻一印曰‘不食鱼斋’。盖幼时久病,医令食鱼四十九日,不许他食,并不许加佐料,仅以白水炙之。初无所苦,逾十日,即生厌,渐致呕吐。达念余日,即废,不能从四十九日之教也。其后遂不能食鱼。”清代梁鼎芬有“食鱼斋”印,石工先生则反其意,刻制多方“不食鱼斋”印。

寿石工之父寿镜吾先生(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启蒙老师)曾宦游山西,寿石工随父就学山西大学堂,后加入同盟会,参加辛亥革命。民国后定居北京,与陈师曾等人创办美术专科学校,并在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古文、诗词、篆刻等。寿石工亦是“南社”成员,并参加湖社画会的活动。

石工先生的篆刻,初师秦汉,后又吸取吴熙载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黄士陵等名家之长,作

品具有古雅之风,其小印尤精,犹如书家小楷,即使印小而刻工之精美为他人所不及,故上世纪40年代石工先生即有“执北方印坛之牛耳者”的美誉。从而学者有金禹民、巢章甫、温庭宽诸先生。

我收藏的这方寿石工先生治的印,是在一块寿山冻石上刻阳文“铁臂晒人”四字,落款“印巧”。此印高3.2厘米、横1.4厘米。在这么小的一块印上刻制如此复杂篆画的字,而且笔笔精到,一笔不苟,极为难得,因此被我认为至宝。

我还有一方金禹民先生为我治的印,是高中学仁代向金先生篆刻的。

金禹民(1906—1982),满族镶黄旗人,姓马佳氏,原名马金澄,字宇民。后以金为姓,改字禹民,号宜斋,别署自耕老人、单臂翁等。巢章甫先生讲:石章钮或有损坏,金先生能补救如旧时。巢先生还讲:金禹民多能,擅于雕塑人物并能制砚,刻铭尤能神形并传不爽毫发,收藏家如徐端甫、郭啸麓、马绍眉,每有铭辞,必属禹民刻之。

金禹民先生1939至1949年任北大篆刻导师,1949年后任职故宫博物院,1973年患病致半身不遂,但仍能单臂操刀治印,我的这方“崔锦所藏”印就是他病后刻制的。落款“乙卯大暑禹民支臂刻”,乙卯即1975年,就是金先生病后两年所刻,但刀法依旧十分精彩,令人敬佩。他还转告我此印极佳,钮也刻制得十分精致,嘱我好好保存。

谈寿石工师徒之印

崔锦

邮缘(七)

郑逸梅:读书励志

吴裕成

洁上丛话

古人文史笔记,三行五行,百字成篇,那不叫“补白”。补白是报刊铅印时代的产物。文稿先排字再组版,版面未排,留有“天窗”,需字数相当的短文填充,这是补白。旧时报界有“无白不补”之说,新闻纸不仅造就了编辑家、名记者,还造就了许多报章体写作的高手,比如篇幅短小多产著称的郑逸梅,就有“补白大王”之誉。散珠成串,集腋成裘,他一生出版文集逾八十种,靠着多读书,多收藏,广闻博记勤动笔,由“报眼股小稿”写手,升华为文史著作家。

上海长寿路的亭子间,我叩开郑逸梅家门,是在1988年一个暑热尚存的秋日。郑先生发型整齐,灰衬衫扎在裤子里,94岁高龄的老人穿着依旧整洁利索。

郑家四世同堂。挺陡的楼梯旁,有属于逸梅老人自己的空间,书房兼卧室,也在这里会客。大约是先生乐于向来访者介绍室名,他指着贴在书柜上方的“纸糊铜瓶室”纸幅,说这是周信芳的女婿在美国写了寄来的。看落款,“戊辰谷雨张中原于纽约”。屋里到处摆着书籍。一张单人床,一个书桌,一把藤椅加一把木椅,几乎没留下插脚之地。置身于略显局促的空间中,得见书桌上的玻璃缸,里面水浸着五颜六色的雨花石。

先生还特别介绍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幅《琵琶图》,“孙女搞美术,这是她的画。我的两部书,也是她画封面。”语调里充满甜蜜的祖孙亲情。说着找出《逸梅杂札》,封面画梅。我问:“身体好吧?”先生回答:“不大好,前些天查出心脏病。”言及保健,他有自己的信条:“一辈子不锻炼身体,只求胸襟开阔,什么也不计较,心情舒畅能益寿。”两三遍地重复,又在纸上写下“胸怀磊落”四字,用笔指点着:“就是这个。”

听上海社科院裴昌讲,逸梅先生集藏颇富,特别是信札。我向郑老求证,他说:“许多年的用心,慢慢积攒起来,其中有明清时代的。被抄去,那些人又不懂,毁掉了。”

说起来,集邮比较大众化,主打邮票收藏,兼及信封明信片;而信札集藏则是另一番天地,看重“信皮儿”,更重“信瓤儿”——信札见证生活,保留历史的细节,又是人际交往的真诚痕迹,原汁原味还富有情感温度。治文史、习掌故的郑逸梅先生热衷集藏,可见他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渴望和路径选择。这是为了治学与写作的集藏。他也会和藏友交换,让给津门书画家巢章甫的藏品中,即有民国时期袁克文和方地山在津过从的材料。

小床床头墙上挂着大幅,陈宝琛所书,落款“八十四岁陈宝琛在洁上”,这对我这位天津访客来说特别惹眼。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。清帝逊位后,仍以“帝傅”身份留在清宫。1925年2月,溥仪逃到天津日租界,陈宝琛追随左右,家眷也随之而来。1931年,溥仪在日本特务策划下潜赴东北,建立傀儡政权。陈宝琛在犬是大非面前坚守大义,拒受伪职,保持了民族气节。郑先生讲,陈宝琛在天津写这幅字,“铁画霜棱肃我襟”,录其七律旧作,书赠胡汉民。当时,电视连续剧《末代皇帝》热播,我建议就陈宝琛这件书法作品写篇文章,“纸糊铜瓶室”主人欣然接受。

告辞时,我请先生在集邮明信片上题字留念。他问,写什么好呢?我说,讲讲做学问写文章吧。逸梅老人执钢笔,一笔一画地题写:“读书励志。郑逸梅年九十有四”,铃上印章。然后,递过明信片,说:字写得不好,手腕有炎症。

过后,郑先生来信,又言及小学:“近日右腕更僵木,字更草率。”他在意自己的写字,一是年轻时受小学国文老师的影响,那位老师是前清秀才,书法工整道美,一是执教生涯使他,如稀之字才退休。“补白大王”其实还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,任中学校长多年。郑逸梅说,“这一生最值得记述的,一是写作,一是教书。”

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(1914.4—2024.4)

我对于梁斌先生最初的印象不是来自他本人,而是他的作品《红旗谱》。自己不一定为芸芸大众所知,而作品名扬天下,这也许是作家最大的骄傲。对于作家来说,为什么要写作?自己的思想和看法,想表达的情感,都在作品之中,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成为读者,能走进自己所营造的世界,那么作家的追求和作家这个职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同时达成。

梁斌先生跟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先生去世于1996年,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我已成年,并且也已开始文学创作,但我和梁斌先生从未谋面,也没有过交集。不过,文学的名义使然,也可以说梁斌先生和我有所关联,因为他的文对我有所启蒙,而他的为人也给我很大的触动。

我和梁斌先生的“缘分”始于《红旗谱》。我并非先阅读了小说原文,而是先收听到电台的小说广播,播音人是天津电台的关山老师。上世纪80年代,我还是一个小学生,痴迷于《红旗谱》的小说广播,中午下课飞奔回家不是先吃午饭,而是先听广播。这是纯粹意义的文学教益,长篇小说的“三部曲”概念,我就是通过《红旗谱》《播火记》《烽烟图》这三部小说知道的,甚至我那时也天真地想过,我也要有朝一日写出我的小说“三部曲”,虽然现在看起来实现无望,但那也是对我文学理想的最初触动。从梁斌先生的“三部曲”中,我获得的还有对文学作品标题的锤炼认知。要知道,一部伟大的作品有一个好的标题,这简直太重要了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观察不同文学作品的标题,理想总是悄悄地下,而教授本领的方式不一定都是有意的和“手把手”式的。梁斌先生的大作我听了读了,并且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,这是最好的学习。在一定意义上说,梁斌先生是我没有见过的老师。

小说《红旗谱》的开头震撼了我,听了广播之后,很快我就找出小说文本,那是我少年时代较早阅读的长篇小说,至今仍记得阅读时的感受。开头的“平地一声雷”,让我感慨了很久,文字是可以有力量的。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忘掉的文字细节还有“朱老巩拿起脚就走”,记得那时我费解了好长一段时间,为什么脚可以“拿”起来,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,确实理解起来有难度。后来我知道了少量方言写作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较好效果,知道了文学修辞的抽象和颠覆,才愈加觉得这个脚“拿”得好。我记住了小说中严家的那块“宝地”,还有那只叫“红脯”的鸟,这都是美好的文学意象,让一个文学少年念念不忘。

和梁斌先生在电视机前的一次“见面”,让我多少有些“失望”,但又由此对文学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几十年来我的记忆清晰极了。我原来一直认为大作家应该风度翩翩、器宇轩昂,但梁斌先生就是一位朴实的老人。这对我文学观有很大的影响——这就是文学,文学伟大,但文学也是件很普通的事情。而梁斌先生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发言内容,对我为人也有很大影响,他说,很多对他赞美的报道他不看,他怕“翘尾巴”,这句话当时对我就是猛然一震,让我思考了很久,以后也以此为警醒。感谢文学,如果不是怀着对文学的热爱,我不一定会关注梁斌先生参加的电视节目,但看了那个访谈让我记住做人担心翘尾巴的自省意识,这是人可贵的品格。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还这样谦虚和清醒,让我见识到了不起的人生修为和境界。

中国现当代的作家、文人,风流倜傥和博学多才的太多了,但在在我看来,偏偏是朴实的梁斌先生十足诠释了文人的形象。不说更大的“文人”概念,只说作家,作家毕竟要有一些人文学科的综合能力和传统文化功底。梁斌先生在书法和绘画领域有很高成就,并且这成就并非来自他的文名、级别或社会地位,就是书法和绘画艺术本身,他水平很高。能书能画的作家,在当代也有不少,但有梁斌先生这样的“单项”和“全能”能力都达到较高水平的,着实不多见。梁斌先生还是一位报人,他有“好几支笔”,写小说和写报道本来是两件事,并不相通,甚至相互扯皮,但他都能做好,也是不易。

近年来我还注意到很多文章提到梁斌先生涉足表演的往事。那个时代,也是困于人才稀缺,文学和文艺的区分尺度并不鲜明,为了宣传之需,很多文人不仅要当编剧写剧本,而且还要亲自扮演角色参与演出。梁斌先生的表演当然没有录像留下来,我认为,在一定意义上,他的表演并非只是工作所需,而是文人素养的一部分,表演是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方式,也是再创作,这是才华、天赋,也是千锤百炼得到的经验,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登台表演的,而艺术门类有内在的紧密联系,梁斌先生融会贯通了。

记得那一年我做律师不久,驾车到保定办案子,回程路过蠡县,那里是梁斌先生的故乡。我特意从高速公路上下来,想去梁斌先生的梁家庄看看。那是初夏,天气已经有些热了。我没有找到梁家庄,那时汽车和手机都还没有导航的功能设置,停车问了几个人,指的路不一样,又加上有的路在施工,总之是没有去成。当时我的车上还有几个伙伴,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朝圣心态和对少年时代情怀的追忆,我相信如果告诉他们,他们也许会支持我继续找下去。我想,我一定会再来的。



杨仲凯

《稍微想起一些》:

在时光倒流中重现一段爱情

刘燕凌



觉到声音的源头,竟看见正在台上起舞的照生。时间复一年倒退,电影刻画了照生和叶的爱情起点及相遇一刻,与两人一起回到恋爱终结时。

本片男女主角的饰演者虽然都是“90后”的日本青年演员,但他俩都是童星出身,已经在影坛拼搏多年。男主角佐伯昭生的饰演者池松壮亮12岁时,就和好莱坞著名演员汤姆·克鲁斯在电影《最后的武士》中有精彩对手戏。女主角叶的饰演者伊藤沙莉更厉害,9岁时就出演了电视剧《14个月,妻子变回了儿童》,她演的角色是一个内心年龄36岁的9岁女孩。有意思的是,这两位演员从小的梦想都不是成为一名演员。池松壮亮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棒球运动员,父母就以送他进棒球社为交换条件,把他哄到了试镜公司。没想到表演真的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扇门,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他都是边演戏边打棒球。有意思的是,目前看起来还是电影的魅力更大,今年34岁的池松壮亮已经出演了五十多部影视作品,还多次在中国电影里客串出演。

都有一个当舞者的梦想。也许有一天,在伊藤沙莉的不懈努力下,观众能见证她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可能正是两位主演拥有这样错位的梦想和人生,才促成了《稍微想起一些》这部影片的拍摄机缘。

4月20日22:22 CCTV-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稍微想起一些》,4月21日15:29“佳片有约”周日影评精彩继续。

满庭芳

第五二四四期

